



文史资料选辑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第一六〇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六〇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60 辑 /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034 - 3221 - 7

I. ①文… II. ①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 IV. ①K25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0027 号

责任编辑: 张建安

封面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2.5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陈福今				
副主任	卞晋平	毛福民	计佑铭	冯骥才	范钦臣
	郑欣森	钟起煌	施子清	桑结加	崔占福
	梁 华	陈光林	周国富		
委 员	王兴东	王晓秋	石 峰	刘兰芳	李兴山
	李国强	李景瑞	余 辉	沈 悌	张 皎
	张 健	张华祝	张廷皓	陈 力	陈 醉
	林 野	黄小同	曹幸穗	曹鸿鸣	戚发轫
	董良翬	滕矢初	陈爱菲	张燕妮	许水涛
	王合忠				

口述历史

- 1 回忆我的父亲陈毅
 ◎ 陈昊苏
- 20 殷殷情结系“三农”
 ◎ 杨志福
- 31 投身祖国的气象科学事业数十载
 ◎ 张德二

辛亥风云

- 46 辛亥革命时的两次“御前会议”
 ◎ 载涛 恽宝惠 口述 溥杰记
- 48 我经历的辛亥革命运动
 ◎ 刘清扬
- 56 《镇南关起义实地见闻》补正
 ◎ 党德信

63 《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的几处考证

◎ 陈守宁

委员园地

69 在人民政协“进修”经历

◎ 邓伟志

87 参政议政十五年

◎ 温克刚

人物春秋

105 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活动经历

◎ 彭泽民

129 川中义士卢师谛

◎ 张宣 张本昉

136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常青树

——黄森同志远行周年祭

◎ 张文惠

文苑艺林

146 凌子风和石联星的故事

◎ 凌飞 凌丽

159 接管《华北日报》的经历

◎ 陶 涵

史海钩沉

167 吴国桢和两蒋的关系

◎ 黄清龙

178 新中国第一炉焦炭是怎样炼成的

◎ 周宣城 张益民

183 打开祖国的绿色宝库

◎ 罗玉川

回忆我的父亲陈毅

◎陈昊苏*

2011年8月26日，是我的父亲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父亲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人民群众的敬仰和爱戴。作为他的长子，我谨以此文，表达自己对父亲永远的怀念。

烽火岁月

我是1942年出生的，那时正值抗日战争中非常严峻的岁月。我出生的地方是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江苏阜宁县停翅港。

说起新四军的军部驻地，经历过一番变迁。抗战初期，军部位于皖南泾县云岭。当时，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父亲陈毅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父亲率领部队东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很大进展。1940年，在苏北盐城成立了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父亲为副总指挥。当时叶挺还在皖南，准备率军部和所属部队开赴苏北，在他到达之前就由我父亲代理总指挥。没想到1941年1月风云

* 陈昊苏，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



突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皖南茂林地区对正在北撤的新四军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叶挺军长率部顽强抵抗，终因弹尽粮绝，兵败被扣，项英副军长牺牲。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第二次反共高潮到达顶点。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不顾民族大义的背叛行径给予坚决反击，宣布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新四军部队尽管有一部分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更多部队遍布大江南北的抗日敌后第一线，按中央指示被整编为七个师，继续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伟业。

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后来又从盐城转移到江苏阜宁县的一个农村，也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停翅港。这里有一汪小湖，湖中有一座沙洲，当地的老百姓俗称它为亭子港。传说在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大飞，有一只凤凰从那里启程北飞，在飞临阜宁县境时，落在沙洲上停翅休息，又继续往北飞走了。后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停翅港。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且有着特别的寓意。凤凰就是我们新四军，我就是在“凤凰停翅”的这段时间里降生的。后来我回停翅港时，老乡们告诉我小湖南边有一个茅草房子，是我爸爸妈妈住的地方。在这附近大概有大小十几个村庄，都是新四军部队的驻地。我是在卫生部所在的侔周村出生，以后就在停翅港住。

1942年年底，因为敌人扫荡，新四军军部又转移到盱眙县的黄花塘。到1945年我3岁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新四军军部随后进驻淮阴，那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1943年年底，父亲应召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一段时间我不在父亲的身边。1945年秋，父亲从延安到了山东根据地，新四军军部也北移到临沂，在那里我又见到了父亲。

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没有保留什么清晰的记忆。我真正记忆比较清楚的是解放战争开始后，大概是1946年和1947年，就是电影《南征北战》所描述的那段岁月。新四军主力和山东军区部队共同组成了山东野战军，父亲任司令员，在齐鲁大地与敌作战。新四军的另一支劲旅就是张鼎丞和

粟裕同志所指挥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部队，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他们在苏中打出了“七战七捷”的漂亮仗。遵照毛主席提出来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我军各部队以运动战歼敌主力，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



陈毅在北京与家人合影

军进行了统一整编，成立华东野战军，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

因为当时部队实行的是运动战，流动性非常大，包括后方机关和我们家属，整天都处于行军的状态之中。记得那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丹淮和小鲁向北转移。我们几个孩子年纪小，走不动路，她就弄了一个小毛驴，驮上两个筐，把我和丹淮装进去。当时小鲁年纪更小，跟着另外的叔叔阿姨们走，我们两兄弟就跟着母亲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摇篮》，我们当时就是坐在电影所表现的马背上的摇篮，随军转战。在我的印象中，马背上的摇篮其实是很舒服的。尽管是长途跋涉，坐在摇篮里也谈不上艰辛。只有一次，毛驴受到惊吓，一下子跳了起来，把我和弟弟从摇篮里颠出来了，还好我们穿的衣服厚实，有惊无险。

1947年2月以后，国民党部队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情况就更紧张了，我们的后方机关和家属就撤到了烟台，后来又渡海北上到了大连。前些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闯关东》。写早年山东的老百

姓携家带口从烟台乘船去东北，与我所亲历的情景很相似。那时我们没有海军，而国民党的海军就在山东和辽东之间的渤海海峡里巡逻，对我们渡海船只构成了很大威胁。我们的渡船都是晚上起航，利用夜色行进。因为怕暴露目标，要求大家都躺在船舱里不能随意走动，不能说话，船上实行灯火管制，出海是很冒险的。我的三弟小鲁，当时年纪才一岁多一点，也会走路了，他就不听话。你要他好好躺着，他不干，太强迫他了，他又哭又闹，发出声音更糟糕。所以大人没有办法，只好由着他在船上活动。大家都躺在船上，他一会跑到这儿，一会跑到那儿。经过海上的周折，我们终于到了大连。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大城市。

大连是个相当漂亮的城市。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汽车。记得当时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小洋房，附近还有体育场。我们住的地方离高尔基体育场不远，母亲曾带着我们到那儿去照相，现在还留下了一些照片。还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鸟笼子，鸟可以在里面飞来飞去的。我们和部队家属的孩子一起在那上面照相，当时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在大连，我开始上学。当时前方部队的同志常过来看家属，有时还会带来父亲写的信。因为我已经上小学，能够写字了，所以也给前方打仗的父亲写信。有一次我还在院墙上写下我们哥俩的名字，然后我们就站在下面照了一张相，托部队上的同志把照片送到前方去，让父亲看一看，让他看到孩子也长大了，也能够写字了。

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取得了胜利，东北全境解放。在山东战场上，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山东省也全部解放。我们在大连大概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又回到了山东。这一次还是走海路，从大连乘船到烟台。大概因为旅程很顺利，我对这次坐船没有太深的印象。上一次坐船是夜间行动，当时因为年纪也小，不知道什么害怕。但后来大人们告诉我们，有的船遭遇了国民党的巡逻艇，打起来了，还牺牲了一些同志，实际上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我们很顺利地就过去了，应该说比较幸运。回来的时候就更加顺利了，那时候我们部队已经控制了整个渤

海海峡，海上已没有国民党的军舰。我们在烟台登陆后，又到了济南。在济南我也上过一段小学，现在的印象已经很淡薄了。当时父亲还在前线打仗，华东野战军不仅仅解放了山东全境，也基本上解放了整个江北，正在准备渡江战役。

这个时候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母亲告诉我们，应该再写一封回信。那时候邮路还不是很通畅，所以就靠信使传递，部队有同志又要到前线去，于是我就捎上一封回信。有这样几句话：“爸爸，我们在济南上学了，你快把上海打下来，派汽车来把我们接过去吧。”信中还有一首儿歌，歌词是这样的：“嘻嘻哈哈乐呵呵，快快活活扭秧歌。妈妈身体很健康，爸爸前线打胜仗，打垮了反动派，一家大小团圆过，你说快活不快活？”我在信上告诉爸爸，这是我唱的儿歌写给你看看吧。这封信后来留存下来了。那是1949年年初，我七岁的时候写的信。有人问这是不是你写的第一首诗，我说不准，因为七岁时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诗，大概是大人教我唱的歌。我把它记下来了也很难得。丹淮当时也写了一封信，他写的信就比我短多了，就是几句话，爸爸你好吗，我们很想念你。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又过了两个月，形势稳定下来，母亲就带着我们到了上海。当时我们先是在浦口乘轮渡到了南京，没有停留，就直接坐火车到上海。一出火车站，就看到马路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因为当时经济形势还相当困难，人们出来抢购日常用品，街上拥挤不堪。我们虽然在大连和济南都生活过，但是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还是头一次来，我见识了大上海的繁华，也感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依然很不安定。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担任上海市长的父亲。父亲的工作很忙，平时我们就在华东保育院上学，礼拜天的时候可以回家看看爸爸妈妈。那时正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大人们都特别特别的忙。9月份，父亲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协的会议，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然后又回到上海。当时我们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们的父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的缔造，他们戎马半生，经历了动乱的岁月、艰苦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新生。

和平年代

解放初期，父亲在担任上海市长的同时，还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政



1950年，陈毅任首任上海市长。

委。华东军区的所在位置是南京，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住在南京。我们在上海居住一段时间之后，也随父亲一起搬往南京。不论在哪里，他的工作都忙，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也不是总能见到他。1952年，那时我10岁，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到苏联去参加联

共（布）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在世时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他出去的时间很长，因为先要到北京集中，然后要坐火车出国。到苏联去的路上就得要七八天，到那儿又参加会议，还有参观考察等一系列活动，这一去来回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父母都出国去了，我们几个孩子就被托付给当时的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同志照顾，他是我们父亲的老战友了。那段时间我记得特清楚，一到星期天钟期光叔叔还有他的夫人凌奔阿姨就把我们接到他们家里，他家的孩子比较多，我们在一起玩得特别高兴。钟叔叔和凌阿姨对我们的学习也非常关心，总是询问我们在学校的表现，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说爸爸妈妈回来是要检查你们功课的。到了1953年，父亲就主要在上海工作了，我们也随着又回到上海。这时我已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在南洋模范中学就读。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父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就到中央办公，以后基本上一直在北京工作。1955年的寒假，我们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北京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寒冷，比

上海冷多了。我还记得坐火车向前门火车站进发，快到北京的时候，先是看到崇文门，然后看到正阳门，一路上都是古色古香的，古迹特别多，让我感到北京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南方口音，同学们经常笑话我。比如问我一件事，我说不晓得。同学就笑，不知道到他那里就变成了不晓得。比如向同学借纸，说给我一张纸头。同学就说，纸还有什么头啊？一开始我的南方口音特别重，后来慢慢地也有所改变。我弟弟陈小鲁，没过多久就完全变成北京口音，很快就适应了北京的人际交往。而我和二弟丹淮已经十几岁了，乡音很难改变，现在说话还带点南方的味道。

父亲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一开始是分管科学、文化、统一战线、政法等工作，曾经参与主持第一个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强调政治领导人要为科学家服务。当时，张劲夫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并负责党的干部工作。父亲对他说，我们国家要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而党的政治工作要为科学家服务，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父亲也拿这个来鼓励我们兄弟，他说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实现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工程师，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他要我们看准方向，努力奋斗，学好科学技术，争取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决定，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父亲的工作，由原来分管的科学、内政方面转到外交了。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除了负责外交以外，他还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父亲对文化事业也很感兴趣，经常就文化问题发表一些重要讲话。比如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他说，从1949年到1961年，我们党领导国家已经12年了。如果说刚刚解放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有一些旧思想，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国

家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等重大问题，有一些认识不清的地方，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现在都搞了12年了，如果还不相信人家，还是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走的，那只能证明我们自己没有掌握真理，没有能力把整个国家包括知识分子引导到新的社会主义方向上去。他认为，我们不能老是把知识分子当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应该看到，解放这么多年来，知识分子也是在不断地进步，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是一天比一天坚定，一天比一天高涨。不应该再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应该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自己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服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地开展一些思想领域的斗争，批判这个作品、批判那个作品，一直到后来搞所谓文化大革命，弄得国内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父亲对此是不赞成的。他主张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有思想问题，生活在不断进步，人们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



地前进。但是不要把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到政治立场这样的问题。要鼓励大家进行政治学习，理解我们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努力为完成这些政治任务而奋斗。他还认为，学习政治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时间应该是让大家学习业务知识。他讲过“又红又专”的问题。他说“红”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是爱国主义精神，是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光有政治觉悟，没有业务上的真本领，不掌握高级的科学技术知识，

1955年，陈毅与周恩来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

不去在业务上创造很好的工作成绩，就可能流于空头政治。空头政治，是不能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取得成就的。那时候，社会上经常批判“白专”道路。有些青年人学习业务的热情比较高涨，来了一个政治运动就批判人家是“白专”道路。弄得很多人都不能专心去搞好业务工作，最后变成了空头政治。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政治甚至发展成为所谓造反，对整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那当然是不对头的了。



1963年，担任外交部部长时的陈毅。

总之，父亲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这段时间里，始终是主张要搞科学的，主

张搞社会主义的建设。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相信过实业救国，或者叫科学救国思想。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因为旧中国政治腐朽，如果不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不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那些科学救国的计划也实现不了。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果我们还是整天在那儿搞政治斗争，不让大家学习业务、学习科学技术，又怎么体现政治对于国家的发展真正起到了促进作用呢？时代不同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了，我们所推行的政治就应该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有利于科学的进步。

以后我们党在这些问题上，显然比以前更成熟了。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复出的时候，就主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明确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已经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所主张的一些东西，虽然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毕竟代表了一个方向。值得高兴的是，这个方向在

改革开放的年代，得到了肯定，为国家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们国家发展的方针，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亲作为老一代革命家提出的主张在今天得到了实现。

“文革”风雨

父亲1954年担任国务院的副总理，195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到1965年三届人大召开的时候，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这已经是他的第三任了。当时他已64岁，他自己也感觉到年纪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父亲到非洲去访问，那个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飞机往返，中途还要换乘，十分辛苦。他一下飞机，就跟到访国家的外交部部长谈判，那些都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外交部部长才30多岁，精力都很旺盛。父亲年纪大了，而且因为是长途航行，又有时差，气候、饮食也不适应，跟这些年轻的部长会谈就觉得很累。所以他回来就说，我们也要有比较年轻的接班人才行。按照他本人的心愿，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退下来，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来干。但是当时没有正常的干部退休制度，1965年刚刚任命他为新一届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当然也不可能马上就提出辞职，还得干一段时间。本想再过几年退下来，没想到等来的不是退休，而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冲击是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一股狂热的浪潮席卷全国，造反派纷纷夺权，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许多为新中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老革命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打倒，被批斗，各部门的正常工作陷于瘫痪。父亲主持的外交工作也未能幸免。外交部其实是最守纪律的工作部门，很多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外交部无非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就是这样，造反派也要给外交部来个全盘否定。当然否定的方法比较“巧妙”，不是说你这个外交全错了，而是说你这个外